

• 学术动态 •

敦煌中医药学的内涵及其学术价值

甘肃中医学院(兰州 730000) 丛春雨

一、敦煌学和敦煌中医药学

20世纪初叶,随着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打开,在洞内沉睡了将近900年的四、五万件六朝、隋唐写本和木刻本籍在人间得以重新露面。这些写本书籍涉及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千余年间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哲学、宗教、民族、语言、文学、艺术、医学及中西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是20世纪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发现。一些外国人闻风而至,把大部分敦煌文献盗劫至国外,各国学者也各就其治学范围,对这批古代文献资料进行研究,成绩斐然,学术界因其地名而曰“敦煌学”。对其中古人有意封存保留下来的文献资料称之为“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伴随敦煌遗书是敦煌学重要的研究对象。中医药学在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遗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大量的壁画、彩塑、图案、题记、书法及藏经洞大批遗书中都有相当数量的记载和描绘,从阴阳五行学说以脏腑学说为中心的中医基础理论,从脉学诊断到内、外、妇、儿临床各科,从针灸到大量的古医方,从本草学著作到医事杂论,从古藏医文献的发现到独具一格的道医、佛医的展示。总之,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实践,敦煌中医药学都突出了古丝绸之路的地方特色,成为敦煌学的重要学科和基本内容。

二、敦煌中医药学的重大学术成就和文献价值

1.敦煌医理类著作,收集七个卷子。大都为唐代或唐以前的写本,其内容多见于《黄帝内经》、《伤寒论》、《难经》等传世医籍版本,但确有部分医药内容是在敦煌藏经洞大量遗书中首次发现的。例如在《明堂五脏论》指出:“纳阴阳而所生,成乾坤而所长。”还说:“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敦煌中医药学提倡适应四时阴阳以保存人体精气的养生之道,重视自然气候变化时人的生理活动与病态过程的影响,从而确立了结合天时地理、形气阴阳进行诊察的方法和辨证施治的根本治疗原则,通过观察外在的体表组织器官的变化以揣测和判断内在脏腑及全身机能,创造并发展完善了《内经》局部与整体的辨证统一学说。敦煌遗书中的《辅行

诀脏腑用药法要》卷子本,是运用五行学说,以五行格局经纬五脏六腑而辨证施治、选方用药,独具一格,其中大小“六神”汤方及五首救卒死方是精华之品,具有特殊的意义。例如:对急心痛、真心痛的患者注意观察唇舌青紫及指甲冷者为其典型外在症候。运用硝石雄黄散舌下给药或随涎咽下速效。这与西医学治疗心肌梗塞、心绞痛患者舌下或鼻吸硝酸甘油等药同出一辙,而敦煌中医药学的记载早其1000余年,这是十分了不起的史绩和贡献。

2.敦煌古藏医药类著作。共收集了五篇珍贵的古藏医药文献,这些古藏文手写本为研究藏族医药学的起源提供了最新资料,在国内外实属第一次看到,这在促进民族医药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藏医药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它是我国藏族人民长期在青藏高原上顽强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为藏族人民的繁衍昌盛做出了重要贡献。古藏医药文献突出的反映出取穴的六种特殊方法,使之更增加了穴位的准确性,有利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这种独特的取穴方法至今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古藏文针灸图是一份图文并茂的吐蕃医学文献,它为研究吐蕃医学提供了真实物证,共3张针灸图均出自敦煌石窟,实属罕见,具有极其珍贵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藏医学与印度医学有着密切关系,“火灸疗法”是西藏民间方法与古印度医学相结合的产物。资料中提到吸收了“羊同”、“象雄”,“大食”等地域及外来医学的治疗方法,从而使藏医药学的内容更加绚丽多彩。这5篇古藏医药文献还揭示出,藏医药学与中医药学存在着最密切的亲缘关系,从脉诊、舌象到辨证论治,从选方用药到内、外、妇、儿各科都受到中医药学指导思想的深刻影响,所以藏医药学是祖国医药学体系中的一个独立的分支和学科。

3.敦煌针灸类著作,共收集6个卷子。虽说其大半已残缺不全,但作为针灸医学的宝贵遗产,它在发掘和研究中华民族医学史上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对于我们研究和拓展唐及唐以前的治疗经验和文献资料,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灸法图》、《新

集备急灸经》为中医灸疗学图谱，是迄今现存的最古老的针灸图实物。图谱中将病症与穴位用线连接起来，可按症取穴，图文并茂，形象生动，准确易懂。敦煌针灸遗书还归纳和辨识了主要疾病及治疗经验。同时也包括了特殊穴位的记载及有关《人神禁忌》的论述。

4. 敦煌诊法类著作，共收集 17 个卷子。与传世古籍对照，除部分内容与《难经》、《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相似外，大多数是不见传世本医书，而且均为手抄本，这为补充、完善、发展、研究中医古代诊断学，特别是脉诊学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敦煌诊法类著作着重阐述了几种诊脉方法，如：三部九候法、寸口诊法、弹踝诊法、跌沟脉诊法的研究等。另外还论述了脉诊理论，如：23 种病脉及主病，脉象的胃、神、根是判断疾病邪正盛衰、预后吉凶的依据。敦煌遗书脉诊写本还特别详述了四时平脉、并以脏腑表里配偶关系，第一次提出了脏腑并举的脉象，具有极其珍贵的学术价值。

5. 敦煌本草类著作。《本草经集注》残卷的发现在于总结魏晋以前本草学的成就，作者创造性地提出了“诸病通用药”的理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治风通用：防风、防己、秦艽、独活、芍药”治黄疸通用药有茵陈、栀子、紫草等。这些理论至今对临床用药都有着深刻的启迪和指导意义。唐《新修本草》卷子的发现，客观上证明中国这第一部药典，比起公元 1542 年欧洲纽伦堡药典要早出 800 余年，这在世界药物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另从《新修本草·草部·卷十》编号 P·3714 残卷来分析，正背两面来抄写，正面为《新修本草》，背面为乾封二年（公元 667 年）至总章二年（公元 669 年）伊西等州驛牒，考证伊西等州均设立于唐贞观年间（627~649 年），其地多属今新疆吐鲁番、哈密一带。这就以历史事实雄辩地证实了，《新修本草》在皇帝颁布后 8 年之内就已传播到边疆伊西等州，运用政府行政手段来实施这部药典，这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还是空前的。《食疗本草》残卷展示了当时社会的全部食疗知识和食疗文化，总结和发挥了药食同源、药食同用的宝贵经验。《食疗本草》残卷在论述药物的功效和主治方面简明、扼要，不仅提出了药食同用的副作用，而且还提出了积极治疗这种副作用的措施方法。同时对药食的采集、加工烹调，因地域、气候、季节不同而有所区别，都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6. 敦煌医方类著作。纵观 1024 首敦煌古医方，不难看出大多数是隋唐五代医学家们的经验医方，均以手抄本留给后人，这些古医方治病相当广泛，包括了内、外、妇、儿、耳、鼻、喉、眼、口腔、皮肤等各科的疾病，此外还有美容的方剂，如面脂、面膏、乌发、洗发、香衣等。运用中医八法，以法审方，以方论法，辨证施治，进行多层次和全方位的考证分析，从中领略到敦煌古医方有其严谨的配伍原则和加减变化规律，以八纲为依据，高度概括了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井然有序，寓意深刻。根据病情的变化，敦煌古医方中又有汗下并用、温清并用、攻补兼施、清下同用的代表方剂。敦煌古医方在外治法的应用方面留下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大约有熏蒸法、焗浴法、涂敷法、贴法、熨法、摩擦法、塞法、导法、搐法、滴眼法、灌鼻法、含嗽法共 12 种之多。

此外，在敦煌遗书中还有着道医、佛医有关的论述资料，对于研究佛家、道家保健有着重要意义。

三、“形象医学”是敦煌中医药学的稀世之宝

敦煌石窟艺术，主要是指敦煌莫高窟建筑、彩塑、壁画三结合的艺术。主体是大约 45000m² 的壁画，是敦煌艺术中最大量、最集中、最丰富、最精粹的部分。敦煌壁画以佛像画、经变画、飞天、供养人、装饰图案等为基本内容，其中经变画，是佛经的形象化，是壁画中变化最大的一部分。通过大量的经变画、故事画可以看到当时社会各阶层及各种人物在生产、生活中的喜、怒、忧、思、悲、恐、惊等情志因素的变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老、病、死、残的生命运动现象，画而真实感人，形象逼真，不仅是一部独具匠心的佛教艺术上乘之品，而且还是一部内涵丰富的珍贵的形象医学史记。“形象医学”是指敦煌壁画反映出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与生活中同疾病作斗争的方式方法。诸如治病救人、子病请医、讲究个人卫生揩齿刷牙、剃头理发、各种运动、气功、洒扫庭院、拦护水井、洗浴、建立厕所、煮沸牛奶等。再现了古丝绸之路千百年前民俗生活的片断，留给后世，发人深省。“形象医学”同敦煌遗书中大量的中医药学宝贵的文献著作相互构成了敦煌中医药学的两大基本骨架，从理论到形象，从经文到壁画，显示出敦煌中医药学独特于其它学科的优势和内涵，是世界传统医学的一份不可多得的宝贵文化遗产。